

寻味贺兰

拓兆兵

从银川市远眺望贺兰山东麓，碧空如洗。塞外冬季，灿烂阳光下，山顶片片白雪如花般怒放，形成了宁夏著名的古八景之一“贺兰晴雪”。

宁夏首个酒庄便以贺兰晴雪命名。如今，宁夏全区酿酒葡萄种植面积达60.2万亩，超过全国三分之一；年产葡萄酒1.4亿瓶，占全国近40%；先后有60多家酒庄的葡萄酒在国际大赛上获得上千个奖项……驾车，贺兰山东麓的宁夏葡萄酒突出重围。葡萄酒的香味，已成为贺兰山最浓郁、最具代表性的风味。

响了！曾名不见经传

2011年9月，《品醇客》杂志举办的世界葡萄酒大赛上，来自中国的贺兰晴雪成为最大黑马。

击败来自世界各地的竞争对手，其中包括阿根廷、美国、澳大利亚甚至法国波尔多本地的生产商，获得10英镑以上级别波尔多风格红葡萄酒国际大奖的，是一瓶来自名不见经传产区的2009年加贝兰——这是当年轰动世界葡萄酒界的一件大事。自此，世界认识了出产优质葡萄酒的中国宁夏产区。

从银川市西夏区北京路拐上沿山公路不远，就来到了贺兰晴雪酒庄。庄主容健提起那段往事，仿佛在诉说一个传奇故事。

宁夏葡萄酒产业起步于上世纪80年代。但直到90年代中期，其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才逐渐被葡萄酒专家发现认可。第四次全国葡萄酒科学讨论会在银川召开时，与会的国内外专家认为：以银川为代表的部分西北地区是中国最佳的葡萄产区之一，也是中国生产高档葡萄酒最有竞争力的潜在地区。

一石激起千层浪。这些观点不仅引起了葡萄酒行业的关注，也让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政府意识到发展机遇。于是，法国的葡萄酒品种、设备、技术和人才被一一引进，建立了一批葡萄酒企业。

1997年，宁夏将葡萄酒作为农业六大支柱产业之一重点支持发展。2001年，宁夏葡萄酒产业协会成立，这是国内第一家省级葡萄酒产业协会。容健担任会长，王奉玉担任秘书长，张静担任副秘书长。2005年，容健与王奉玉先后退休，3个人萌生建设一个示范性小酒庄的想法。地址选在贺兰山脚下，取名贺兰晴雪。容健与王奉玉搞管理和种植，年轻的张静负责酿酒。

3个人的酒庄条件简陋，处于半手工状态。当年，酒庄开荒种下了第一批8公顷葡

萄，张静到中法两国农业部门的合作项目——中法酒庄实习，拜首席酿酒师李德美为师。

2009年，贺兰山东麓产区气候条件优越，葡萄成熟度非常好。2011年初，酒庄顾问李德美萌生了把2008年、2009年两个年份的酒送到国际参赛的念头。

“酒庄报名参加英国《品醇客》杂志举办的世界葡萄酒大赛时，主办方的产区选项里甚至都没有宁夏。颇费一番周折，才报上了名。”李德美回忆。

2011年9月，该项赛事颁奖仪式在英国伦敦举行。公布结果时，让所有在场嘉宾感到震惊的是：中国宁夏贺兰晴雪酒庄2009年份加贝兰葡萄酒夺得赛事最高奖！当时很多人不知道中国能生产优质葡萄酒，更别说知道宁夏！

这个奖项对全世界所有生产波尔多风格葡萄酒的地区开放，把最高奖项颁给贺兰晴雪，意味着中国生产的葡萄酒得到了世界认可。

蒙古语里，“贺兰”就是骏马的意思。由此，宁夏葡萄酒产业踏破贺兰山缺，进入壮怀激烈的高速发展时代。

稳了！没有不可能

略微有些酸，也有点甜，还有点儿涩……贺兰山东麓产区的葡萄酒处于榨季后的发酵期，空气中弥漫着葡萄酒酒糟中的味道。

赤霞珠、马瑟兰、霞多丽、长相思……品类众多的葡萄百花齐放，加上混酿碰撞，或激越，或温柔，或甜蜜，或羞涩……倾诉着各自的故事，绽放着各自的风格。

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区，位于北纬37°43'至39°23'之间，是业界公认的世界上最适合种植酿酒葡萄和生产高品质葡萄酒的黄金地带之一。昼夜温差大，葡萄易于聚集糖分；黄河冲积平原与冲洪积倾斜平原交汇地带的半砂质土壤，让葡萄枝与葡萄秆的水分得到很好调节。

多年来，宁夏先后从国外引进以红、白、甜、露四大系列为支撑的60多个酿酒葡萄品种体系，引进20多个国家的60多名国际酿酒师在产区服务，聘请20多个国家的冠军侍酒师作为推广大使。200多个酒庄和酿酒企业分布在百公里葡萄酒产业长廊，参观百多个酒庄，宛如周游列国。

加贝兰获奖后，来贺兰晴雪参观访问和品尝的人很多。“人们夸赞，酒的风格非常波尔多。但我觉得加贝兰要成为宁夏的加贝兰，而不是波尔多的加贝兰，也就是要成为自己。”张静说，宁夏产区是一个很独特的、具有自己风土特色的葡萄酒产区。

与贺兰晴雪酒庄仅一路之隔，迦南美地酒庄的风格及酿酒师的个性、理念、目

标、方法均与之不同，可有一点是共通的：成为自己。

庄主王方旅居德国10余年，对有“德国葡萄酒女王”之称的雷司令品种情有独钟。2011年，王方带着对家乡酿酒业的憧憬回到宁夏，建了一个200多亩规模的小酒庄，开始了自己的酿酒生涯。

在宁夏，种植雷司令一度被认为是不可能的任务。但因酿酒风格大胆、敢于打破常规而被业界称为“魔方”的王方坚信：脚下土地就是雷司令的希望之地。果然，贺兰山东麓种植雷司令成功，酿出的酒清爽、酸度适中、口感清脆。

短短几年，迦南美地酒庄酿造的葡萄酒就赢得了国际声誉，曾作为唯一一个亚洲酒庄受邀赴德国参加展出和一年一度的雷司令盛宴。

除了标准瓶，迦南美地酒庄还推出了如试管一样的小瓶酒，便于携带和直接饮用，很受年轻人青睐。“葡萄酒产区。我对我酿的酒有着绝对自信，我坚信宁夏产区能酿出好酒。”王方说。

风土共享，风格各表。走进西夏区博纳佰酿酒酒庄，草木丛生，完全不修边幅的自然状态。庄主孙森和彭帅是一对年轻夫妻，2013年从法国留学回国，来到贺兰山下酿酒。酒庄面积只有100多亩，建在一片盐碱地上。

酿酒东麓下，悠然见兰山。俩人都在法国著名的勃艮第产区工作过，选择了自然传统的田园生活生产方式，自己开拖拉机、施肥、除草、酿造、养鹅、喂狗……“两个人的酒庄”个性十足。“每串葡萄里都有我们的体温，每瓶葡萄酒里都有我们的心血，我们在做一座最典型的艺术酒庄。”孙森说。

打开一瓶2015年的红葡萄酒“馥”，拥有可爱甜美的果香和略带俏皮的青味，如春季贺兰山散发的生命萌发的气息。博纳佰酒庄年产量1万多瓶，酒畅销上海等大城市。

彭帅师从著名葡萄酒专家、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李华教授，孙森师从李华教授的夫人、著名葡萄酒专家王华教授。小两口师从老两口，两代人致力于葡萄酒的研究和酿造，成为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区的佳话。

准了！寻味即寻路

这些各具特色的葡萄酒，有一个共同语境：贺兰山风土。

风土，是一个地方特有的自然环境。于葡萄酒而言，风土就是魂魄。七分种植，三分酿造，产区的风土对葡萄酒的品质和风格有着决定性影响。

贺兰山东麓的风土条件得天独厚，但对于葡萄酒产业发展初期的宁夏来说，如何把大自然的馈赠做成人间臻品，是摸着石头过河。走弯路、资本抢滩、无序发展、质量低下，没少踩坑。

下图为志辉源酒庄。(资料图片)

2003年，在自治区党委和政府的努力下，当时的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批准对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区实施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这借鉴了国内外葡萄酒产业发展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对宁夏建立自己的产区保护和把控葡萄生产品质非常有益。

次年，宁夏组成考察团赴法国了解葡萄栽培和葡萄酒酿造技术。考察中发现，葡萄酒生产在欧洲大都以酒庄形式存在。考察团形成共识：宁夏葡萄酒产业想要有更高水平的发展，一定要打造一批致力于酿造高品质葡萄酒的精品酒庄。

2013年，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区开创实施了具有自己特色的酒庄分级制度。宁夏紧紧抓住了风土和酒庄制两个关键词。

深刻挖掘和充分表达贺兰山的风土魂魄，专注于“酿一瓶宁夏风土的好葡萄酒”，葡萄酒产业蒸蒸日上。

张言志，1995年就读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葡萄酒学院，之后留学法国。这位在葡萄酒界摸爬滚打的青岛汉子，2017年到贺兰山东麓成立西鸽酒庄。虽建庄较晚，但短短几年间规模和销售均处于国内头部位置。“让世界爱上中国葡萄酒”，这句镌刻在西鸽酒庄墙上的话，是张言志立下的志向，也是贺兰山东麓产区的愿景。

袁辉，1996年开始在贺兰山下种植防护林，2008年在废弃砂石坑中建起志辉源酒庄。酒庄以贺兰山废弃石料为主材，种下3000亩葡萄，修复6000亩废弃矿区。以志辉源酒庄为代表，贺兰山走出了一条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相结合的路径。

虽在国内几大葡萄酒产区中起步较晚，但贺兰山东麓产区表现亮眼，2021年国家葡萄及葡萄酒产业开放发展综合试验区、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落户宁夏，2022年，国际葡萄酒品牌中心也落户宁夏。

山之魂，人之魄，黄河水灌溉，贺兰山守护。假以时日，宁夏贺兰山东麓产区葡萄酒“当惊世界殊”。



俯瞰西鸽酒庄。(资料图片)



星空下的赤水回长城。冯开华摄(新华社发)



西鸽酒庄橡木桶酒窖。(资料图片)

速写

慢洞台

洞台，是一个村名。距慕田峪长城8公里，距京郊响水湖4公里。

暖，沿怀柔乡路寻洞台村，仿佛是在去探访一位老友故知。清晨的阳光洒向燕山山脉，沿着蜿蜒山路驱车行进，便来到这个青山环绕的静谧村庄。

驾车冲上一处百米斜坡，韩秉亮棵高大的核桃古树旁，见一家叫“井邻”的花园民宿：八家为一井，三井为一邻。借古言今，建造者有意打造一个资源共享、睦邻友好的乡村社区。

民宿创办人石晶看着蓝天白云重叠高山长大。在互联网行业打拼多年后，她重回宁静乡村创业，还把乡村生活方式作为卖点。上百棵百年栗树、核桃树与近万平方米的草坪，是“井邻”与其他民宿最大的区别。繁星鲜花、乐趣农场，吸引着城里的情侣来这里办婚礼，他们背靠长城，在灿烂繁星和古栗树的见证下，许下共度一生的誓言。

看重这份闲适，嫁到中国的越南人阮玉恒把家从城里搬到了这里。“越南生活节奏比较慢，来到洞台村就像是回家。”负责“井邻”烘焙房和活动策划的阮玉恒把越南咖啡豆带到洞台村。现在，咖啡店里大部分员工是村里大姐，她们不仅跟阮玉恒学会了做咖啡，又学起了插画、扎染、烘焙。

“最近几年流行‘习慢者’这个概念，就是习慢慢去生活的人。我来到井邻是想变成习慢者，也想让每个前来看的游客感受慢生活的时光。”阮玉恒说，最美的日子是在自然里自然醒，听着鸟声，看着阳光，任窗外花开花落，云来云往，都能安静下来思考。慢慢地吃饭，仔细品味每一口食物，慢慢闲逛看看整个园区的花草，徒步村庄，爬爬山，找到自己真正的方向。

山一程、水一程，风一更、雪一更，连起来，就是漫漫人生路。洞台村有个更宏伟的目标——打造乡村版的“阿那亚”，这里的父老乡亲，正用独特的乡村生活方式，提升乡村生活的品质与吸引力。

本版编辑 陈莹莹 李静 姚亚宁 美编 吴迪 来稿邮箱 fukan@jrbns.cn

生活中的经济学

路越修越堵，只是错觉吗

刘奕彤

道路，承载着城市中人与物的流通，是城市交通中的核心组成部分，社会经济发展离不开它，生活也离不开它，所以才有了“想要富，先修路”这样响亮的口号。

城市越扩越大、车越来越多，很多地方通过不断修路来满足人与物不断“膨胀”的出行需求。这样的行为听起来再正常不过——在城市发展初期，道路建设进程往往滞后于机动化发展进程，这个时候需要有足够的道路承载交通流量，的确得修路。所以我们经常会有“到处都在修路”的观感，坑坑洼洼，尘土飞扬，感觉无论走到哪儿都是修路的围挡。

所以，每当出现交通拥堵，人们会下意识认为：还是路不够多不够宽，多修点就不会这么堵了。这么想其实没错，在发展初期，修路甚至可以称得上是解决交通拥堵的捷径。但当城市发展到一定阶段，人们会逐渐发现：路确实多了，但交通好像依旧是堵的。

不止我们，交通经济学家也注意到了“修路但堵”的现象，并研究出了一条非常著名的当斯定律：在政府对城市交通不进行有效管制和控制的情况下，新建的道路设施会诱发新的交通量，而交通需求总是倾向于超过交通供给。

也就是说，“路越修越堵”的情况是客观存在的，且有科学依据。

当斯定律尝试为我们描述当城市发展到一定阶段时的情况：

一方面，道路供给赶不上需求增长。社会经济发展繁荣，居民拥有和使用小汽车的需求持续高涨。但城市中的路网规模和级配已相对完善，尤其是中心城区，几乎没有土地可用于修建新的道路。也就是说，道路交通供给在这个阶段已经几乎不会出现大幅增长了。

以北京为例，在实施机动车调控政策前，机动车保有量增速维持在10%以上，在2010年甚至达到了20%，实施机动车调控政策后维持在4%左右。2022年，北京的道路长度同比2021年长度增长0.67%，道路面积增长1.4%。对比车与路的数据可以看出，就算政府对机动车保有量已经严格控制，其增速也依旧让道路的扩张速度望尘莫及。

另一方面，一条新路修成后，会刺激产生更多新的交通量，这就是经济学概念中的“诱导需求”。简单来讲就是，一条好走且畅通的新路开放了，自然会吸引很多人来走——原来不走这边的人来了，之前

坐公交地铁的人也转而开车来了……用不了多久，这条新路就会开始发生拥堵。同时，这条路还会发生交通流的“网络化效应”——路总是互通互连的，这条路交通流量大了，相连的路也难逃拥堵的命运。

这两点，就是当斯定律想要告诉我们的：修路之所以无法作为解决拥堵的长期方案，是因为城市中的道路供给是有限的，且道路供给总会不断诱导出新的道路需求，供给永远无法和需求实现等比例扩张。换句话说，在“修路VS买车用车”的竞赛中，修路永远都是“输家”。

国内外很多城市都有过“越修越堵”的惨痛教训，但也有城市意识到了问题，选择“反其道而行之”——拆掉一些高架桥、减少或收窄车道，将节约出的空间归还给骑行、步行以及公共休闲。大家从习惯性地开车出行逐渐转向公共交通和慢行出行，最终收获了好结果。

路，肯定是要修的。我们需要与城市规模、人口数量以及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匹配的道路基础设施，但“修路”“修宽路”并不是缓堵的唯一“良方”，解决问题的根本，还在于推动出行方式的转变。

(作者系北京交通发展研究院工程师)